

为了中华
为了世界——许嘉璐论文化
下

许嘉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为了中华

为了世界

——许嘉璐论文文化
下

许嘉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嘉璐：近年来，我有计划地与佛、道、基督、犹太各教代表人物进行交流；我还曾和伊斯兰、神道以及婆罗门等教人士面对面地畅谈过。我之所以愿意和儒家之外的各种文明及其宗教进行交流，是基于以下想法：近三百年来，世界进入了文明多元化跟一元化这两种主张和趋向并存并激烈博弈的时代；自20世纪之末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以来，这一博弈日益凸显。这一比拼的结果，将决定着人类未来的命运。

工业革命之前，那时的不同文明对话，只是局部的，线性的，自发的，主要的形式是贸易、传教和战争。工业革命以后，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方式与性质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18、19世纪欧洲自视为世界中心，“殖民运动”挟裹着基督福音向世界各地强行撒播和渗透；延至20世纪，美国接替了欧洲“世界中心”的角色，继续推行世界文明的一元化。而面对一波又一波的一元化浪潮，近三百年来，弱势国家和地区只能不自愿地、被迫地承受着自己的传统被扼杀、摒弃、遗忘的残酷现实。

这种一元化的趋向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巨大的能量，并且它也必然地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这种一元化给当时的思想家带来了什么？从制度设计到宗教信仰，再到对价值尺度、终极真理的哲学思考，这种一元化的趋向被这样那样地全盘接受下来，形成“一元主义”的思维方式。

然而，文明有着超出思想家们想象的伟大与顽强。文明一元化在实施强大压力的同时，也自然孕育并激

发出坚持传统、抵制文明移植的巨大力量。从 20 世纪末起，一元化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文明多元化的呼声减速了。遍布全世界呼唤多元化的声音，是由西方发起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现代化的强大趋势辩证地催生的。物极必反，当推行一元化的力度接近极致时，它的对立面就出现了。

主持人：当这一情景进入到思想家的视野之中，必然会掀起波澜。

许嘉璐：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多元化是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多元之间的接触、碰撞、妥协和相互吸收是各种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只有多元，各种文明才能获得相互接触、欣赏、吸取这样一种自身发展的外动力，以适应、维护并促进不断演变前进的社会生活和世界形势。换言之，如果文明单一，或虽内部多元，而缺少和外部足够的接触，则这种文明必然要渐渐衰微，乃至消亡。如果着眼整个世界，则可以预计，文明的单一化也将预示人类的停滞、倒退、灭亡。

但是，潜在于人民意识中的对多元文明的需求以及学界一波又一波的论证、呼吁、抗争，在现实中，其力量至今仍是微弱的。应该看到，文明有着拒绝异质者的本能，所以“一元主义”为了实现自己想象中的情景，就要诉诸刀枪，虽然平时主要是靠人人喜闻乐用的文化形式和物质产品。人类要达到彻底摆脱两百多年的桎梏，消除忘却民族智慧、失去自我、无所适从、灵魂空荡之苦，将是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

所以我说，文明的一元化与多元化这两种理论和实践是一场长期的博弈。明智者，当前必须向人们揭示文明多元化的必要和必然，以抵消相反理论和实践

的影响；然后，经过若干年代的努力，脱下铠甲，打开心锁，让良知战胜贪婪，让文明跨越边界，使世界真正成为友善、包容、和睦、幸福的家园。

人类需要的那种坦诚的、善意的、意在求得相互了解、理解的交流，现在通常称之为“对话”。这个世界需要对话。这种对话，往往从学者开始。因为学者的思考有着比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更为宏阔的知识背景（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等）和更为深刻的对历史和社会走向的关怀。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是文明多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是历史的主人。智者的言论可以作用于人心。只要真正渴望人类和谐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世界一定会有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共荣的一天。

二

主持人：您充分论证了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即将召开的尼山论坛也将有力地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但由此也让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诚如您所言，文明对话本身是博弈的产物，加之长期以来“一元化”思维定式的影响，作为博弈的对手，对话如何可能？

许嘉璐：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史所揭示的规律看，如果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地区、社群之间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这一狭小的视野——这当然不能妨碍了人类共同追求的正义和平等的原则——来审视当代世界的特征，那么，所有的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也就是全人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霸权国家还是后殖民国家，也不管

是富豪还是贫民、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困惑和痛苦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工业化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和知识范围，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物质生活的便利和质量，但是它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的对立，人身与人心的对立，现在与未来的对立，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可以这样说，这些对立凝聚成了这样两个很少有人思考，但却极为现实的问题中：什么是幸福？人类将走向什么样的终点？现实中的种种对立在生活中就体现为科技发展的加速度、追求财富的欲望之不可节制与人的心灵需要一定的沉静和信仰、人类不仅需要物质更需要自我认识的精神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所引起的人之个体和群体精神的迷茫，仇恨的莫名，社会的断裂，危机的频发，已经向人类显示了可怕的未来。因此，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该只是被文明一元化所折磨的弱势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的需要，其实也是发达国家、霸权者、富豪和强势群体的内在需求，虽然他/它们未必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不同文明对话成果之益的，将是整个人类。

三

主持人：我了解到，尼山论坛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办的世界文明论坛。这是否意味着，在文明的问题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许嘉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话已经在世界上举行过好几次。在美国、西班牙、新加坡，都举行过。而在这些对话当中，我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咱们人参加。只有在马德里那次会，人家两家对话，我们是列

席。当时学诚法师就作为列席代表团的代表，做了个简短的发言。发言讲佛家的理念，人家没听过，没见过，非常欢迎。这让我想到，世界上应该有中国的声音。应该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怎么办呢？中国办论坛！论坛把朋友请进来，同时也可以让文化走出去。

中华文明在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中应该而且必然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向以极大包容、注重和谐、酷爱和平著称；我们有着保证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地保持几千年一统和稳定的文明因素和丰富经验。中华文明的内涵，的确有许多可以作为其他文明的参考，用来补充、纠正、制衡现在统治着全人类的西方文明，以便人类在未来共同创造出能够真正促进自身进步，保障地球安宁与和谐的新文明。例如中华文明把对道德伦理的无止境的提升作为最高的追求；视自身为宇宙的一员，以“我”与“他”为同体，提倡体现无疆大爱的“仁”；虽然自古没有形成崇拜人格神的全民宗教，但是仍然有所敬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等。尼山文明论坛通过对话所要追求的，也正是中华文明里天下为一体的理念所早已反复论证并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主持人：您说过，多元化是人类文明、文化的本质属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正是充分体现这种文化本性的。那么，通过论坛发出中国的声音，同时也就意味着是在发出文化的心声。

许嘉璐：是的。

四

许嘉璐：还有一点，就是想要通过对话来推进我

们的儒学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国内学界存在着就儒学论儒学的研究倾向。而对儒学的价值，儒家文化的价值，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认识。搞儒学的，应该同时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基督教，应该研究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应该研究神道教。这样一比较，才能看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可贵，也看出老祖宗的毛病。这样儒学、中华文化就能往前走了。这次请来的外国学者中有不少和我对过话。我们把众多朋友请来，可以给我们的儒学研究者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推动咱们儒学的进步。

我就想，一个民族文化的振兴，要靠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这词是费孝通老先生提的。我也用这个词，但是重新界定了。概括起来，文化自觉就是一个民族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清醒的、全面的、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要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规律、内涵、走向。这样的文化自觉，首先需要知识精英来担当，由知识精英把自己的民族文化放到世界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去认识、研究、解读、散布。

主持人：通过对话，在国际视野中提升我们的境界，推进我们的学术建设。

许嘉璐：现在中国正在参与世界上各种对话，不同层次，不同形态，都是对话。但是不能缺的就是这种直插文化根底的哲理的对话，要引向深入。没有深入，其他的文化形态走出去，就可能是不自觉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高端对话的平台。

主持人：谢谢！

危机，期盼，伦理，责任：构建人类共同 新伦理[※]

当前，人类陷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危机，地球上的每个地区和国家几乎都无法幸免，所有的人都将是危机的牺牲品。这一危机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忧虑，因此往往不需要罗列所呈现出的种种外在形态，“危机”一词即可引起几乎所有人的丰富联想和强烈共鸣。

各国的智者、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多年来为缓解和消除这些危机提出过无数的建议、计划、技术和模型。但是，就在人们焦虑、呼吁，希望挽救人类文明、找到光明前途的同时，造成危机的种种恶行和劣迹并没有丝毫收敛和消减的迹象，甚至可以认为，从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情况更为严重了。

危机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主要不在于技术发明，不在于管理模式，不在于技术创新（虽然这些举措都是很重要的），也不在于种种协议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无实惠上，而在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在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

※ 2014年5月21日在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演讲。

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我想，这里的“战争”一词，指的是人类危机在层层积累之后最终爆发的极端形式；“人之思想”之所指，美国过程哲学家，密歇根伟谷的斯蒂芬·劳尔的一段话，可以被视为一种较好的解读，他说：“现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沉溺于物质主义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对‘消费主义’的过度迷恋；导致意识形态僵局的成熟地将凡事都绝对化的倾向。”“最大的问题是高分贝地讴歌物质生活而贬低精神生活，贬低我们的人性。”（2014年的一次对话）

如何“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怎样医治已经侵蚀了全球的“疾病”？正如近些年在世界各地已经出现的，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各个民族正在回归古老的传统，重新回忆和温习轴心时代伟人们的教诲，反思民族的既往，认清民族、群体和自身所处的位置，思考建立现代的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这恐怕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药方。日本哲学家山胁直司（Nao YAMAHAKI）把这种共同道德规范称之为“公共（共同）善/恶伦理学”（《作为21世纪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跨国公共哲学观念》，《第欧根尼 DIOGENES》下，2010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目标的实现，将是长期的，艰难的，因为需要全世界形成广泛的共识，尤其需要不同信仰、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决策者们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了信仰、超越了政治的共识，找到异中之同——对人类未来负责，关怀所有人这一共性——发挥出他们特有的影响功能。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痴迷过深，其背后常常隐伏着垄断寡头和超级富豪组成的真正决策力量。即使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人

们的焦虑、呼吁和抗议，并非毫无成效，尤其是各国智者的声音，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最终形成数十亿人趋向的大势，因为我们所坚持的，是人类的良知，是社会和历史的规律，是人心之所向。

为此，应该引起不同信仰对伦理重建这一最紧迫、最核心、最易取得共识的问题的重视，形成一个面向当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寻求不同信仰下的伦理之“同”的遍及五大洲的潮流。

就信仰而言，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可以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着眼于不同信仰的基点/基要，彼此间还可能是对立的，例如有神论之与无神论，一神信仰之于多神信仰，天启神论之于自然神论。但是，两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和神学已经用丰富的成果告诉我们，即使是对立的双方，彼此也有相通之处，严肃的神学历史学家也已经揭示了从古到今的无数例证。同时，如果追寻到人类童年时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信仰之所以出现，“因缘”几乎是相同的，都是要解决初民对死亡的恐惧和由此而生的一系列困惑：宇宙是怎么形成的？“我”是从哪里来的？将走向哪里？“我”是谁？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这些关于终极性的疑问是几乎所有文明和民族之所以形成信仰与宗教的出发点。而用后代的哲学术语说，这类问题其实就是宇宙观、社会观和价值观。

信仰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信仰的本质和规律所决定的。因而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对人们的信仰横加干涉或强逼他人皈依某种信仰，更不应该因为信仰不同，或以信仰为借口而对他人动用野蛮手段。从另一个方面看，不同信仰间应该并可以避免发生冲突，

其关键是需要大家认可彼此应该通过对话协商促进相互的了解，寻找共性，消除隔阂和误解。

研究人类危机的种种问题，就需重新思考如何解开人类就终极关怀所存在的困惑，这涉及几乎物质科学、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但是，在寻找危机中的人类出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的问题时，后者有着独特的伟大的职责。诚如俄国当代哲学家尼古拉·奥梅利琴科所说：哲学“可以扮演人类灵魂治疗师的角色”，“是人类救赎的一项条件”。（《作为一种治疗的哲学》，《第欧根尼 DIOGENES》，2010年）“而当前最为紧迫、最为可行的，是越过信仰的鸿沟，探索各民族的伦理是否具有共同性以及共性之中的个性如何保存”，因为“世界越拥挤，规范就变得越必要，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罗素：《回忆录》）。世界的规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共同伦理。伦理，是在确定信仰后由信仰所派生，用以指导社会行为的规范，是民族和族群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不管是通过天启的途径还是以人间圣哲为导师把它形成戒律或信条，作用是一样的。

伦理的共性是客观存在。既是由于人类的恐惧和困惑是相近的，也是因为“人”无一例外地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然的关系的交叉点上，因而所有不同信仰的伦理之间天然地存在着相同或相通之处。正是因为伦理的这一特性，所以欧洲的伟大哲学家们，三百多年前已经关注到应该与不同信仰下的伦理进行交流并相容。例如从莱布尼茨到罗素都对中国人的伦理称赞有加。罗素曾经到过中国，并且居住了将近一年；而莱布尼茨只是通过与到中国来传教的人士通信，搜集有关中国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也是传教士带回

欧洲的) 来了解中国, 而且他知道中国人的信仰和欧洲人和他的同胞有着极大的差异, 例如对“善”和“神”的理解(《中国新事》)。他之注意并欣赏中国伦理, 恐怕和他的“单子论”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很可惜, 后来黑格尔完全抛开了莱布尼茨; 从这点来说, 罗素则又正确地抛弃了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 替欧洲发现了中国。这两件事不能不令人深思: 四百年前和将近一百年前的两位哲人, 能够提出不同信仰下的人民在伦理方面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学习, 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站在时代前沿, 基于自己的哲学理念, 为了人类的和睦与社会的幸福、进步, 因而把目光转向东方, 胸怀和胆略远远超过了他们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吗?

伦理, 除了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相同或相通, 亦即存在共性, 当然还有着各自的特性, 彼我之间不但内涵、外延有所差异, 而且对社会成员约束的程度、伦理的传承渠道和方法、在历史长河中演变的情况等方面也都有很大不同。但是各自的特性并不会阻碍我们寻求共性以形成现代的共同伦理。

各个民族伦理有着同类型的源头: 一个是宗教或信仰; 一个是在宗教和环境双重影响和制约下所形成的习惯和风俗。这两个源头出现的时间有先后, 但是对伦理的影响却是难分伯仲的。伦理, 无论是神启的还是自为的, 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的, 也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其原始和终极的指向都是为了协调身心关系、人的社会关系, 人和自然的关系, 目的是使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生活稳定、安全和幸福, 使种族可以延续下去——这是人类的宿命。既然终极源头相近, 不同宗教和信仰的伦理中存在共性这个道理,

当然是自明的。

试看亚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几位伟人对当时人们的劝说，都没有离开“善”和“爱”，只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中用了不同的词语，例如在孔子那里更多的是用“仁”（Ren），而佛陀用的是“慈悲”（Cibei）。按照中国人的理念，我们的爱和善应该并可以广延到天地万物，而天地万物中也包含着对人类的的爱和善（在这点上，与莱比尼茨、释迦牟尼很相近），于是中国人的伦理系统和网络就形成了。用这个道理去观照希伯来文化中的十戒、伊斯兰教的七戒、佛教的五戒、二十五戒、儒家的“礼”和对修身的种种提示和要求等等，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早已和轴心时代有了极大差异，即使和莱布尼茨甚至罗素时代比照，也有了很大不同。我们姑且抛开学术界半个世纪以来围绕着“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这些概念的争论，只看看在社会生活中所呈现的“现代”形态和人类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人类急需建立起以平等尊重、和平友爱、共同富裕、保障权利、环境友好等为基础的人类新伦理，这一伦理的最终目的很简单：我幸福，你幸福，他幸福，大家都幸福。还是罗素说得好：“如果世界要从目前濒临毁灭的状态中脱颖而出，那么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是必须要有的。”（《回忆录》）这一“新限制”，就是我们在探求的人类新伦理。

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文明多元化的客观事实体现了文明的本质。多元，意味着各种文明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即使我们接受“文化多样性”这一概念，也应该给以科学的定义，阐明这个概

念将拒斥在多样文化中有一个预设为最优秀者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被山胁直司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观念。山胁直司就此还写道：“事实上，不是文明，而是忽视文明引起了相互间的冲突。”的确，文明多元化，起码包含着对任何文明都同样重视，彼此平等、承认、尊重、包容（不是带有恩赐色彩的“宽容”），进而了解、理解，从对方那里发现自己之所缺，于是欣赏之，学习之，充实改善自己，因而也丰富了世界。

在这一可能是非常漫长的旅程中，显然地，各国的智者承担着特别沉重的责任，一方面需要用学术的工具、方式、话语和智慧，回答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难题，并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开来；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与各种违背人类持续生存、繁衍、发展所需相悖的“理论”进行博弈。从来未经论证的民族优越论、特定民族中心论，以及三百多年来统治着人类头脑的“不成熟的将凡事都绝对化”（斯蒂芬·劳尔）的思维习惯都是实现真正的正义的障碍。

无须论证，智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今天的世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自20世纪末，在世界各地，人文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神学家、自然科学家就着人类的未来如何摆脱“现代”的噩梦已经进行了许多次对话，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现在，似乎到了应该把这类对话推向更加深入层面的时候了。我设想，今后我们可否相对聚焦于如何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进行对话？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人类共同新伦理包含的内容和标志性概念是什么。我们还可以由此再逐步深入到解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进步”“发达”和一个个体、家庭和族群安全、“幸

福”的内容、标准和指数应该是怎样的，怎样测定才是真正科学的。换言之，我们的对话将提供给人们一个另类的思考角度，不再以抽象的自由、人权、民主概念为标记，不再以国家和地区的GDP，个人、家庭和族群所拥有的财富作为评价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标准和指数，至少把社会内外部关系、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个体的身与心的关系纳入衡量范围，而且这些项目的权重应该远远超过经济方面的指数。当然，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况不一，标准和指数也相应有所不同。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评价标准和指数中，已经包含了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主要内容，因为它是根据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以及社会的本质规律而构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把用财富衡量社会和个人当作主要或唯一标准，是工业革命以后，即“现代化”社会的产物，亦即“现代性”在社会层面的具体显现。我们对启蒙思想、信仰、知识、语言和真理的反思，固然是对造成现实危机的祸根的批判，但是，如果我们给公众提供的只是信仰和伦理的概念、分析和论证，没有可供更多的人可见、可懂，可把握、可参与，并与自己的切实感受一致的公共目标，也就很难动员身受其害的无数人民，当然也就很难影响各国各地区的决策者，从而要刹住人类快速滑向万丈深渊的列车，也更加困难。

在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化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合而不同的社会观、以仁为己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符合大自然和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正好补充现代性的缺口，改正现代化所带来的

荒谬。“尼山论坛”和全中国的学人，都十分愿意为了这一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2014年5月17日晚

于日读一卷书屋